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二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九二期 ——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3c）

| | | |
|--------|--------------------------|-----|
| 【史实辨析】 | 《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的若干比较 | 余汝信 |
| 【书刊评论】 |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 | |
| |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一） | 丁凯文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实辨析】

《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的若干比较

• 余汝信 •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邱会作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文革前，他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文革中，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九一三”事件后身陷囹圄，又被指称为“林彪反党集团（后上升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上月底，文革中的经历占其篇幅二分之一强的《邱会作回忆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世，这应该是文革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十分值得关注的大事。

笔者近日阅读了这部倾注了邱会作二十年心血的著作，受益匪浅。前几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对文革史的研究是一个突破，但对史实的把握和认识尚有探讨之处。近日笔者将《邱会作回忆录》与当年地位与其不相上下的吴法宪的回忆录作了若干比对，觉得它无论在思想认识的深刻度抑或史料的准确度诸方面，均较《吴法宪回忆录》为优。以下数例，仅为一己之见，尚请识者不吝赐教。

一、关于罗瑞卿问题

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毛泽东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手法和途径，吴法宪与邱会作的回忆差异颇大。

吴法宪称，罗瑞卿问题，是叶群迟至1965年11月末才告诉他的：“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汇报完时，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她当晚就返回苏州，并告知林彪，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叶群的这些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可在电话上也不好问。”（《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页956—557）

吴法宪似乎将罗瑞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言下之意，是林彪主动向毛告了罗的状，毛听了之后还要“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而邱会作则称，1965年5、6月间，叶剑英、聂荣臻已就罗瑞卿问题向他打过招呼，而且，“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

“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我当时就想，叶、聂议论罗的问题决不是犯自由主义，叶、聂都是原则性很强、修养很深的人，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这也说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给主席写信之前，早在主席召叶群去谈话之前，主席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对主席的意图早已心知肚明了。因为主席找叶、萧、杨他们谈话可以说是了解军队的情况，但叫谢富治去了解公安部的情况，就和军队的问题、林罗之间的关系问题毫不相干了，所以，叶、聂二帅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应当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决定的，比如不给贺龙打招呼，这么大的事，叶、聂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听说林彪给谁打过招呼，林也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讲罗的问题。”（《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377—378）

邱会作还认为，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而《吴法宪回忆录》通篇都达不到这样的认识水平，还是在林、罗关系上绕圈子。邱会作称：

“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道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况的自有人在，主席很早就知道了罗瑞卿的问题，主席自己对罗有所警惕了。对罗的问题，主席的确是有打算和安排的。

.....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主席已经在吹风，所以，整罗、整杨尚昆，及以后整彭真、陆定一，毛主席都是通盘考虑的，把他们当成修正主义，把他们看成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来考虑的。并不是象外面所说的：林要整罗，主席要拉林一起搞文化大革命，违心地支持了林。”（《邱会作回忆录》，页380）

吴法宪强调，叶群是上海会议的主角，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甚知情：“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找我谈话。我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吴法宪回忆录》，页559—560）

吴法宪的话，应有违史实。众所周知，上海会议虽是毛泽东建议并主持召开的，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上海会议的小组负责人，罗瑞卿从昆明一抵上海软禁地点，是周恩来、邓小平与其谈的话，交代政策，不了解罗的问题，如何召集会议，如何与罗谈话？

笔者认为，邱会作对上海会议的叙述是到位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由毛主席主持，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罗瑞卿，会后他就下台了。这次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他们主事的，军队是萧华、刘志坚在管会议的事。

“参加上海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有军委常委、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军队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主要首长。中央机关少数人参加了会议，吴冷西就分在我们组，记得梁必业、王新亭是后补上来的，会议开始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才来的。

“大会召开之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我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毛主席最后叫了叶群，林写信向毛主席报告罗的问题时，已经离上海会议没几天了。毛认为林都反感罗了，那么，倒罗的条件和时间已经成熟了。”（《邱会作回忆录》，页393）

吴法宪在罗瑞卿问题上有很重的负罪感。他在上海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均有发言，惟他称，两次都是在叶群威逼下不得不说的。在上海，“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吴法宪回忆录》，页559）在北京，“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得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吴法宪回忆录》，页565）

在这里，吴法宪似乎将自己摆放在批罗主角的位置上了。故而，“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吴法宪回忆录》，页566）“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当初审理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作了如实的交代。”（《吴法宪回忆录》，页566）吴法宪果真是批罗的主角？据邱会作的说法，不是。邱会作称：

“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我从一九五九年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天天和罗在一起办公，罗对我有拉也有打，但对我的工作支持还是多的，我当然怕把我划在罗的一边，我也积极发了言。当时，积极发言批评罗是很风光的事，但是还轮不上我风光，比如三总部的发言，总参、总政都是由杨成武、萧华发言单列的，只有总后没有单独向中央的书面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言，地方干部也发了言，我还没有听说参加了会议而没有发言的人。罗的秘书也在会上做了揭发。”（《邱会作回忆录》，页399）

邱会作在批罗问题上不仅没有吴法宪般的“内疚”感，而且他认为：

“叶、萧、杨、谢的发言，在中央下发《中央工作小组报告》时作为附件也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邓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当时，自己的发言能上简报，甚至上文件，是很风光的事情，这样风光的事当时还轮不到我们。后来，‘两案’公审的时候，整罗的大干将们对此只字不提，我们这些跑龙套的人却成了犯有大罪，天下岂有此理？！”（《邱会作回忆录》，页411）

“现在一些报刊上，甚至公审的时候，说我们迫害了罗瑞卿，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要说打倒罗瑞卿是对的，这个功劳还轮不上我们抢；如果说打倒罗瑞卿是错的，这个主要责任也不该我们担。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组的会议上发言的都是错误的，那人人有份。”（《邱会作回忆录》，页413）

二、关于“五一三”事件

1967年5月的“五一三”事件，是军内文化大革命的一件大事，《吴法宪回忆录》与《邱会作回忆录》均有所提及。

王年一在多年前即已指出：“五一三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它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件，其实不然。这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直接关联，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此为契机，开始依靠‘三军党委’和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左右文革的进程。”（王年一：《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五一三”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与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的刘素媛。由于她向毛“告御状”，毛由支持、倾向军内造反派（即“新三军”，后又称“冲派”，得到萧华、杨成武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转而支持军内保守派（即“老三军”，保空军吴法宪、海军李、王、张及总后邱会作，后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问题上，《吴法宪回忆录》语焉不详，而《邱会作回忆录》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吴法宪称：“在‘老三军’这边，有一些演员是能够直接‘通天’的。于是，她们把演出的问题直接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林彪就说：‘你们演出吧。’”（《吴法宪回忆录》，页673）

吴的所谓“有一些演员”，指的就是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据直接接触此事的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毛并非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毛知道林彪是断不会亲自接见刘素媛等女流之辈的），而是让徐业夫向叶群传“一组”（即毛）的话“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刘素媛是空政文工团的保守派，王年一认为，毛“让叶群找她们谈谈”的真正含义，是要叶群支持她们。

刘素媛可以说是吴法宪的间接下级。她与毛的关系，吴法宪是心知肚明的。吴本应是可以

将问题讲透一点的——为什么毛一句话，就可以扭转军内两派斗争的局面？惟吴法宪没有能讲清楚的，反倒被邱会作讲清楚了。

邱会作称：“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什么机会呢？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导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媛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叶群的话等于林总已经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邱会作回忆录》，页 5 2 7—5 2 8）

邱会作认为，林彪、叶群这样做，其实是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当时，毛主席还是支持造反派的，还是相信造反派的力量的。展览馆‘激战’时，刘素媛在毛主席处，她告诉主席说革命派胜利了，主席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造反派还会翻过来。’但毛主席是支持刘素媛的，幸好刘素媛是个革命派，是拥护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如果刘素媛是个造反派，毛主席也会支持她，那军队的情况就会更复杂、更恶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邱会作回忆录》，页 5 2 8—5 2 9）

毛泽东本人从未就“五一三”事件公开表过态。邱会作称：

“在文革中，每一步大的行动都是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下进行的，‘五一三’却不是。毛主席对‘五一三’的态度，并不是作为党的指示由总理下达的，而是通过一个能与主席接近的文工团员刘素媛传到了总理和林彪的耳朵里……‘五一三’事件是海、空军机关和三总部、各军兵种广大干部群众站出来反对打砸抢，反对造反夺权的结果，当然从本质上也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结果，但这又是有悖当时毛主席‘造反有理’路线的。在‘五一三’事件中，林彪对造反派的态度也亮相了，林彪是支持这一行动的，因为‘五一三’是打击军队造反派的，打击了军队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军队才能稳定下来。

“在‘五一三’事件后，军队广大高级干部对造反派的态度也明朗了。换句话说，在地方上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毛主席认为是支持他，可是在军队，广大高级干部认为，打击造反派、稳定军队才是拥护毛主席。军队和军队造反派谁重要，毛主席心里清楚，但‘五一三’事件又和他‘造反有理’的路线格格不入，‘五一三’事件后也使江青不能带着‘造反有理’的‘路条’插手军队。两个月后，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毛主席本人也对造反派有了新的看法。”（《邱会作回忆录》，页 5 3 0—5 3 1）

三、关于“七二〇”事件

邱会作是1967年7月武汉“七二〇”事件的亲历者，是“七二〇”事件发生当天从北京飞武汉将林彪（有说是江青）的一封信亲手交给毛的带信人。他关于此一经过的回忆，应比吴法宪或其他人（如陈再道）的回忆更具权威性。

吴法宪关于此一经过有两段话：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来的意见，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的详细内容我不清楚，主要是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同时，江青又给张春桥打电话，要张春桥立即赶到上海，亲自安排毛主席到上海的一切事情。

“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飞机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多钟到的武汉，之后邱会作由刘丰带往东湖宾馆，见到了汪东兴，然后再由汪东兴带着去面见毛泽东，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送信的任务完成后，邱会作马上又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吴法宪回忆录》，页687）

笔者有理由怀疑，吴法宪的“回忆”脱胎于早些年已出版的《陈再道回忆录》。只不过陈再道的“回忆”绘声绘色，比吴法宪的“精彩”：

“经过林彪、江青的一番策划，决定派邱会作、张春桥分别乘专机飞往武汉、上海。在邱会作临行前，江青向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听了江青的话，为了防止万一出现情况，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于下午两点十分赶到武汉，乘另一架专机的张春桥，也于下午四点二十分赶到上海，精心安排了如何‘迎接’毛泽东。

“邱会作赶到武汉之后，立即展开了‘外围战’。他先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商量毛泽东转移到哪里最合适。由于邱会作早已胸有成竹，商量的结果自然是把毛泽东转移到上海最安全。

“下午五点多钟，邱会作见到了毛泽东，说明来意，他把那封信交给了毛泽东。他还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请毛泽东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毛泽东打开那封信，一边看信一边笑了。显然，毛泽东是将信将疑的，对于是否立即由武汉转移，一时没有拿定主意。如果走，到哪里去？是到长沙？是到上海？还是到南昌？

“一直拖延到晚上八点多钟，毛泽东才同意去上海。

“翌日凌晨两点钟，毛泽东坐着武汉空军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人的秘密护送下，离开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在即将离开武汉前，毛泽东又问邱会作，为什么从武汉转移？想到长江去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情愿离开武汉的。”（《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页341）

陈再道与吴法宪的“回忆”，都说的是邱会作7月20日下午2时多到武汉（时间有误，但这并非很重要）。邱会作是到位于武昌的东湖宾馆见到了毛泽东（地点有误，这点却十分重要）。换言之，毛泽东在见到这封北京来信之前一刻，尚未有意转移到外地。按陈再道的意思，毛是看了这封信，又经过邱会作的动员，才最终决定转移的。言下之意，毛不是因“七二〇”事件，不是他陈再道逼走的，毛是不情愿离开武汉的，是被林彪、江青哄骗走的。吴法宪上了陈再道的圈套。他在回忆录中声称“晚上八点钟，毛泽东终于决定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陈再道说：“一直拖到晚上八点多钟，毛泽东才同意去上海。”）“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陈再道说：“翌日凌晨两点钟，……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而据邱会作的回忆，他是7月20日晚上11时左右才抵达武汉王家墩机场（位于汉口）的，到后他一直在机场待命。他是7月21日凌晨3时多在机场铁路专线停放的毛的专列上见到毛的，他将林彪的信交给毛之前，毛已从东湖宾馆转移到了王家墩机场并已决意离开武汉。换言之，林彪这封信对毛是否离开武汉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根本没有作用！）毛的专机是21日上午才起飞的，在此之前，邱会作根本不知道毛要去上海。

邱会作如此叙述他的武汉之行：

“当天晚上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〇一医院时带上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伊尔十八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到达了武汉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到场部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火车上召见了。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他老人家的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那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这时，我即向林办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

“大约七点半左右，停机坪上三架伊尔十八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杨成武搂着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飞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毛主席。我一下飞机，飞机就起飞了，警卫部队上了另外的飞机。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谁开主席专机的问题，本来执行任务的是飞行团的团长王进忠，余立金不放心，最后他选中副团长潘景寅，团长王进忠改为副驾驶。这个潘景寅就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为林彪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飞行员。”（《邱会作回忆录》，页534—535）

四、关于江青召集会议攻击周恩来一事

1970年5月17日，江青召集黄、吴、李、邱以及李德生、姚文元到她住处钓鱼台十一楼，听她讲“历史”。江青在谈话中除了吹嘘自己之外，还谈及了周恩来历史上所犯的一些错误。据邱会作称：“江青上来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邱会作回忆录》，页682）

江青这天的谈话，对黄、吴、李、邱来说应是记忆犹新的。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却把这次谈话的时间向前移了一年：“一件事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我、

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江青住处开会。”（《吴法宪回忆录》，页753）吴法宪显然是记错了。

听到江青如此攻击周恩来，黄、吴、李、邱均觉得事态严重，当天即向林彪作了汇报。邱作会说：“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邱会作回忆录》，页682）

经毛泽东同意，黄、吴到了毛处。据吴法宪回忆，毛并没有说什么有份量的话，而且，“临走时，毛泽东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说完，毛泽东还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我们到他这里来过。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汇报不感兴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如象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吴法宪回忆录》，页755—755）

邱会作与吴法宪说的则不大相同。邱称：“不久，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所说的几句话，当黄永胜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只好混了。’这几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毛主席的凉屁股上，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邱会作回忆录》，页682—683）

从“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一句话可以看出，同为军人，邱会作的政治敏感度比吴法宪略胜一筹。

关于向周恩来报告此事，吴法宪称：“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政治局的会议后，我们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也许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不好表态，周恩来在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是一笑了之。”（《吴法宪回忆录》，页683）

邱会作是向周恩来报告的当事人，他的回忆与吴法宪则有所不同。邱称：“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理也是很激动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3）

邱会作更具政治敏感度的是如下一段话：“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地看，并总以为是江青目中无人，口出狂言。现在看来，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另外，这也是主席通过江青在拉我们，主席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意图来进行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不是没有拉动我们，而是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邱会作回忆录》，页683）

黄永胜、吴法宪在毛泽东处碰了一个软钉子，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黄、吴在各自的检讨中同时主动提及几乎一年前的这件向毛告状而不予受理的往事。黄永胜在检讨中称：“第三、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

的人和问题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黄永胜同志的检讨》，1971年3月21日）吴法宪在检讨中称：“四、去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永胜、作鹏、会作同志和我两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永胜同志和我一起向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吴法宪同志的检讨》，1971年4月9日）

以上吴法宪这一次检讨的内容，在他本人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

五、关于中共中央得知林彪专机失事的准确时间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得知林彪乘坐的256号专机在蒙古失事的？《邱作会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记载有所不同。

吴法宪的回忆，是1971年9月15日的下午。吴称：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点我起床以后，空司来电话报告说，禁航的命令已经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要他们继续检查，防止发生飞机、人员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点，我和黄永胜来到周恩来那里办公。我们进去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那里。接着，周恩来带领我们集体了解‘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研究问题，包括查询三叉戟飞机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点，周恩来告诉我们，外交部已经报告，证实有一架中国的大型军用飞机，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个地方失事，飞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周恩来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馆派人去察看情况，并设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点钟，周恩来又告诉我们，三叉戟飞机确实已经烧毁，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全部烧死，飞机残骸散布在温都尔汗附近大约八百米的范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件事上向我们表示友好姿态，外交部已经电告驻蒙使馆，将死亡人员和飞机残骸拍摄照片送回国内，最好能将遗体也运送回国。

“周恩来又问我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我说，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转卖给我们三架三叉戟飞机中的一架，刚刚改装出来，准备作专机用的。看样子飞机是想在温都尔汗迫降而没有成功，起火烧毁的。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副驾驶和通讯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他没有飞过蒙古的机场，又是个政治干部，平时飞夜航少，缺乏经验，所以飞机必然会摔掉。

“周恩来说：‘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这个问题。’说完，周恩来就准备去向毛泽东汇报，我们也就休息去了。”（《吴法宪回忆录》，页868—869）

邱会作的回忆，则是在1971年9月14日上午。邱称：

“九月十四日 今天上午八时就起来了，一个人坐在家中办公室苦思。脑子里好象装满了杂货的箱子一样，好象什么都有，但又好象一个空箱子，里面什么也没有，真的不是滋味。下午我把林彪出逃事，同胡敏和路光说了一下。他们听了之后，除了震惊之外，要说的话很少。

“我同往常一样在家里的办公室一一翻阅文件，我在《三部要报》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报，昨凌晨一时许，中国一大型运输机入侵，在肯特省温都尔汗坠毁……’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很好。我已经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没有开会。晚上开会时，周总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

外蒙古温都尔汗堕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九个人都死了。

“张春桥听到周总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后，亲自到外间服务台拿出一瓶茅台酒和数个杯子。他手拿着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他给每人斟了一杯酒，并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好工作。’当他走到吴法宪面前时，还特别说：‘我们诚心共事合作！’他走到总理跟前时，也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我听没听清楚，总理没有站起来同张春桥碰杯。张走到我跟前要碰杯，我说了一句双关语：‘我要再喝就更迷糊了。’我没有同张碰杯，张也没有再去和黄、李及其他人碰杯。总理宣布完林彪的死讯后，就叫汪东兴立即到中南海去。不久，汪又回来了，他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此时，张春桥自己哈哈大笑了好一阵子。

“散会后，我又到京西宾馆去同李作鹏闲谈。刚说话不久，李的秘书送来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发回来他们对扣押在山海关机场人员的审问记录。李一页一页地看，并一页一页的递给我看，记录稿很长。在一张记录稿上有两点：一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要把他们交回空军，以免被杀人灭口；二是，被审的人交待：他们听林立果说，在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会上决定李作鹏、邱会作的任务是解决钓鱼台，要抓住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我看完那页记录之后，李作鹏问：‘你害怕不？’

“我说：‘说得越邪乎越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现在不是害怕的问题，是主席怎样对待我们的问题了。’

“我说：‘我们现在是在下地狱的口子上，可以下去，也可以不下去。以我的估计是非下去不可的！我们军委办事组已经垮了。中央军委已经由叶帅接管了，空军由李德生接管了，北京军区由纪登奎控制了，黄、吴、李、邱都成了闲人。”（《邱会作回忆录》，页797—798）

根据多种资料佐证，邱会作说的时间是正确的。如《周恩来年谱》1971年9月14日条记载：“9月14日 下午连续工作达五十个小时后刚休息，即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报告，获知林彪等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随即，亲往毛泽东处报告情况，并代外交部起草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许文益特急电文，要求转告蒙方：对中国失事飞机坠入蒙境表示遗憾，请蒙方协助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视察，交还死者骨骼及其他遗物。

“傍晚，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林彪等人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页482—483）

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回忆：9月14日中午，外交部即收到中国驻蒙大使馆用中苏关系恶化后已封闭两年多的从乌兰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频专线电话传来的报告，得知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坠毁在蒙古首都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机上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报告即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处。下午2时，周恩来来电话，对外交部的工作感到满意并指示：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符浩：《林彪之死》，载《60个瞬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

类似这样明显的时间性错误，在回忆录类的史料中实难以完全避免。《邱会作回忆录》在此问题上也并非白璧无瑕。如1971年3月底去向林彪汇报的北戴河之行，邱会作回忆离开北京的时间无误，但向林彪汇报的时间（邱记载为4月1日）错了（《邱会作回忆录》，页757—758）。根据《周恩来年谱》，汇报的时间应为3月30日、31日。31日晚，周恩来等一行已返回北京。（《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447—448）不过，类似这样的错误，在《邱会作回忆录》中较难发现，而《吴法宪回忆录》中所在多有就是了。（2

0 1 1 年 2 月)

~~~~~  
【书刊评论】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一）

• 丁凯文 •

继今年 1 月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邱会作回忆录》之后，今年 2 月北星出版社出版了程光先生的《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所有引文仅注页码），这部书稿笔者五年前就已读过，现今才得以正式出版。可喜可贺！尽管已读过多遍，但是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令人感叹、激愤，常常心潮起伏，不能自己。文革时期，邱会作是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成员，文革期间列席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参与了中央最高层的政治活动。然而，因 1971 年 9 月的“林彪事件”受牵连下台遭到迫害。这部《对话》最有价值又最为吸引人的地方是，邱会作作为军队高层领导人亲身经历了文革这段疾风暴雨的峥嵘岁月，特别是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有着极为密切的近身交往和观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人们重新认识、研究文革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最佳史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邱会作在谈话中不虚饰造作，不回避敏感事件，不为尊者讳，坦言直白，对这段历史有着深邃的洞察和精辟的见解。这部《对话》是对文革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口述回忆，也是人们深入研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无比珍贵的历史史料，其重要性、独特性是迄今为止国内所有老干部官式回忆所无可比拟的，其价值将随着研究者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彰显，时间会证明邱会作的口述回忆是一部不朽的传世巨著！笔者不才，愿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和感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笔者的讨论从文革初期开始，直到“九一三事件”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案”审判。

一、打倒罗瑞卿问题

罗瑞卿事件是文革开始时的一项重大事件，也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之前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长期以来，国内党史教材众口一词，认为罗瑞卿的倒台是林彪的诬陷，而毛泽东为了换取林彪对文革的支持而打倒了罗瑞卿。由官方认可的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就持这一观点。（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第 75—76 页）这一观点已成为国内研究者的定论，海外一些人受官方影响也持此一观点。

邱会作的回忆首先对解放军中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渊源作了详细的厘清，特别指出中共建国之后军内两大最主要的“山头”：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内部出现的矛盾，林彪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和贺龙为代表的红二方面军是军中两大派系，1959 年彭德怀下台后，毛泽东任命林彪与贺龙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实行军队内部两大“山头”主政。由于林彪身体不好，1962 年秋开始贺龙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此军内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方是贺龙、罗瑞卿等人，另一方则是林彪、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双方的矛盾、也逐渐从含蓄到激化，从隐秘到半公开。

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在搬开罗瑞卿之前，军中高层实际上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1965 年 6 月间邱会作在军委常委会议期间就听到叶剑英、聂荣臻谈话中批罗是“利令智昏”，“手伸得长”，8 月间叶剑英更是将邱叫到家里打招呼，毫不隐晦地批判罗瑞卿，并直言这是毛

泽东交代的，被打招呼的人包括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黄永胜、韩先楚等军队高层干部，叶剑英交代说打招呼的范围还要进一步扩大，让大家不要陷入贺龙、罗瑞卿的圈子里去。（页9—10）邱会作的这段回忆揭穿了官方所谓的所有参与上海会议的人员均不知道会议内容的谎言。此外，官方还刻意突出12月初叶群向毛泽东告罗状，而隐瞒了当时还有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集中向毛泽东作了好几个小时的汇报，告罗瑞卿的状，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表态说：“对罗的霸道，我想得出来，并对林彪同志讲过几次。他搞阴谋，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安心养病，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页11）

根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所有被告知参加会议的人除了贺龙一人不知会议内容以外，其他与会人士都心知肚明。上海会议采取“三无”主义：无文件、无记录、无简报，并对罗采取“背对背”批评方式，其中叶剑英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邱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的激昂慷慨呀。”（页13）上海会议撤销了罗的军内职务，叶剑英日后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1966年3月份在北京继续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罗，由叶剑英主持会议，但是由于林彪定下了“死规矩”，批罗不许涉及贺龙，叶剑英说服与会者执行了林彪的意见。由于叶剑英将罗的亲信揭发材料让罗看过，罗因此想不开而跳楼。叶随后吟诗一首：“将军一跳身名裂”。（页15—16）随后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向中央揭发罗的“罪行”，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央则在5月份下发了这一报告。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毛泽东倒罗并非如现今的党史教材所言，是毛泽东在1965年12月初误信了叶群的告状之后才下决心倒罗。打倒罗瑞卿一事在军内事实上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其中军内的几位老师起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在军内采取的几项重要部署即可看出端倪：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长提升为第一副总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毛泽东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停职审查，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毛泽东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对罗瑞卿的权力的限制和防范。（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6期2004年2月6日）1965年12月初毛泽东倒罗在即，但还要得到林彪的明确表态，由此才有了叶群匆匆忙忙拼凑了几条罗瑞卿的“罪状”赶赴上海对毛作汇报。

关于罗瑞卿倒台的问题，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林彪对倒罗是什么态度？以笔者的分析，林彪对于军中的动态知之甚清，对于罗瑞卿架空自己而倒向贺龙有所不满，林彪还曾特别提醒罗要注意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要多团结一些人。毛泽东通过叶剑英等人向下打招呼准备解决罗的问题时，并未见到林彪有所行动，林也从未召集下属打过招呼，亦不曾见到林彪对倒罗公开发表过什么谈话或指示批判罗瑞卿。林彪内心未必赞同毛泽东对罗采取的严厉的组织措施。上海会议实际上由毛自己幕后主持，实际出面组织会议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林彪并未在会议上露面。但是林彪对会议的过程应该是了解的，否则在上海会议结束罗下台成定局时就不会有林彪向毛建议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一事。对于3月份的北京会议，批罗虽是大方向，但林彪却要求批罗不许涉及贺龙（页15），实际上是保护了贺龙，避免军内斗争扩大化。

（2）在倒罗问题上，到底是毛主动还是林主动？以笔者的分析，军队是毛泽东的禁脔，也是毛泽东解决党内斗争的最终手段，所以毛泽东对军队必须有绝对的掌控，而对军队的指挥

具体的体现就应该是毛泽东—林彪—罗瑞卿。但是由于罗瑞卿与贺龙结为一体，而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甚笃，军内无形当中形成刘邓—贺龙—罗瑞卿，这种格局绝非毛泽东所乐见的。再加上刘少奇曾经公开说过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触及了毛泽东的禁脔，尤其是毛泽东正着手准备发动一场针对刘邓中央的大举措之前，绝对有必要对军队领导层动一次大手术，将军队的指挥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邱会作指出“起初毛主席对威胁他权力的防范还是泛指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按毛主席自己后来说的，对刘少奇警惕了。在这种背景下，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罗瑞卿联系起来了。原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统帅人民解放军的概念模糊了，‘刘邓—贺龙—罗瑞卿’的模式为一些高级干部所习惯，这是毛主席没有料到和最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罗瑞卿下台，并为贺老总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页7）此时军内两派的矛盾以及林罗之间的矛盾正好被毛所利用。林彪虽然在倒罗一事上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的责任还在毛泽东。

（3）军内两派矛盾形成的责任何在？目前官方的说法是，罗瑞卿抵制林彪的“顶峰论”和“政治挂帅”，由此引发了林彪的忌恨。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和肤浅，掩盖了实质问题。军内“山头”的形成有其历史上的因素，毛泽东也是善于搞平衡术的老手，军委副主席就分别由一方面军的林彪与二方面军的贺龙出任。平心而论，罗瑞卿是军内的实干家，有魄力、有能力，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以往整人太狠，表现在党内斗争中的1953年的“高饶事件”和1959年的“彭黄张周事件”等，另外，罗瑞卿以军中第二位实力人物自居，其他老师们往往不放在眼里，对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工作更是支持不够，甚至将叶剑英发现的军内“郭兴福教学法”的功劳据为己有，引起叶剑英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罗还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圈子，由此得罪了军内一批人，尤其是军队的老师们，这些人恰恰就是日后倒罗的骨干，而这一点正是官史所刻意隐讳不提的。军内两大派系的矛盾、林罗之间的矛盾以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终于引发了文革爆发前夕军内的一次大动荡，也对日后中国政治形势的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二、严慰冰的匿名信和陆定一的倒台

官方的党史教材通常将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说成是“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78页），惟这类党史教材却刻意回避了这些匿名信的真实内容，也从不说明这些匿名信到底揭露了什么谴责了什么？据现在人们所知的内容，严慰冰给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写了数十封污辱人格的匿名信，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对林彪一家人进行人身攻击。从信的内容来看，严慰冰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历史早已证明，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标的卑鄙，而卑鄙的手段也绝达不到高尚的目的。现在的官史教材无论以什么方式为严慰冰作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亦无法掩盖严慰冰的犯罪事实。严慰冰的可耻行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引起众怒。邱回忆说“在周恩来主持的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该案侦破情况后，周厉声问陆定一知道否，并大声喝斥：‘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样下流的手段！’说着说着，抓起面前的茶杯向陆定一砸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周恩来大发脾气、当众失态。”（页19）此外，坊间还长期流传了1966年春叶群与严慰冰在北京王府井某商场狭路相逢而林彪因此自己破了“匿名信”一案的说法，这种市井传闻现已被广泛传播，以讹传讹。而实际情况却是，严慰冰的匿名信事件由公安部组织破获的，与林彪毫无关系，这一历史功劳还是应该记在周恩来、谢富治等人的头上为好。（有关严慰冰匿名信案问题，可参见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500期 2006年5月15日）

邱会作认为“陆定一严慰冰是夫妻，但他们并非同案，即便陆定一有责任，也是党内问题，把陆定一逮捕关进秦城监狱是错误的，至少是感情代替了政策。凡是用感情代替政策的时候，

也就没有政策了。”（页19）

笔者认为，邱会作的这一看法是准确的。严慰冰案属于以造谣诬蔑为手段破坏他人家庭幸福，是恶意人身攻击和诽谤，属于刑事犯罪，并非政治犯。陆定一的倒台则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所必须采取的政治措施，拿掉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扫清刘少奇的外围，这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战役中的前哨战，陆定一的倒台是毛泽东倒刘的必然结果。

### 三、搞政变者防政变

当毛泽东处心积虑要整倒刘少奇时，毛首先想到的就是借重军队的力量，而这支力量只能为己所用，不能为刘邓司令部所用。在发动文革运动之前，毛泽东除了及时拿下罗瑞卿，将军队主要领导人换上自己最信得过的人之外，还要重新部署北京地区的军事力量。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周恩来、林彪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军队的实权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上，中国并无发生军事政变的任何可能性，亦不存在刘邓等人借用外国力量搞政变的可能性。为何毛泽东还要通过林彪的嘴大肆强调“防政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呢？

1966年的5月18日，林彪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大讲了一通“防政变”讲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首都工作小组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组员有杨成武等人。这个小组就北京的安全作了以下工作：“1、对政变时易受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地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城郊的机场、水库、发电厂、监狱等重要设施，对建设中的地下铁路、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可能进人的）等要害处实地勘测，对玉泉山毛主席战时指挥所，由汪东兴陪着我们看了个详细。2、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师），指挥权分别属于军队、公安部、中央办公厅三家。一旦有情况，政出多门，可能谁也指挥不动。这次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林彪特别嘱咐杨成武一定要调自己的亲信部队，指挥起来得心应手。这个“工作小组”的存在颇为神秘。邱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和一些工程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页24—25）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别人”应属刘少奇、的“党中央”无疑。

笔者认为，毛泽东这番调动军队，名义上是防止外来发动的政变，实际上是为自己搞一场特殊的“政变”作好万全的准备。此时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通过正常的手段不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毛对此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在非常的时期就要使用非常的手段。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有意思的是，历史竟然重演，1971年夏季的毛泽东重演

了1966年春天的戏码，而这次却是指责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图谋不轨，篡党夺权，毛也同样是南巡各地煽风点火，调兵遣将，积极部署一场歼林战役，其手段与1966年春如出一辙。可笑的是，如今国内的党史教材竟然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依然指责林彪图谋政变，却有意放过真正搞了特殊政变的毛泽东。

#### 四、林彪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了中央领导人，林彪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名副其实地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官史对林彪是怎样成为接班人的往往语焉不详。而邱会作的回忆弥补了这一缺憾。

邱会作的信息来自于陶铸。陶铸在会后成为全党的第四号人物，邱等人前去祝贺，陶铸向他们讲述了这段秘辛。邱回忆说：“那是中央全会中期以后的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陶铸去毛主席家谈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饭，便戏谑地说，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想混一顿饭吃？陶铸说是谈工作、如果有饭也混一顿吃吃，诙谐地消除了拘谨。在谈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在全会上激起的义愤，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追回来的。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陶铸、康生写的‘周’，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的‘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页40）显而易见，中央全会虽然名义上进行了改组选举，事实上在毛泽东处早已“选举”过了，全会的选举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那么林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林彪实际上是诚惶诚恐。在全会的闭幕式上，林彪发表了一番讲话“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全会后，军队的干部们去林彪处看望，实际上是祝贺他成为毛的接班人。邱回忆说：“我们去大会堂林彪住的那儿，名义是他从北戴河回来后我们礼节式的看望，实际上这是对他的祝贺。这应当是很高兴的事，但林彪没有一点的喜气，反而沉闷地对我们说：我是不想干的。既然全党委托，主席又一定让我来，硬是推，不会有好的效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试试了。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事情到了他不说不成的时候他才会说。我们和林彪交往了多年了，他说的是真心话。”（页41—42）由此可见，林彪当初也是勉为其难地被毛泽东硬拉上了文革的战车，由此欲罢不能、愈陷愈深。

#### 五、军队卷入文革斗争和林彪的对策

八届十一中全会开毕，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吹响了文革的号角。那么军队高层与林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目前大陆的党史教材异口同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和主张，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97页）长期以来，国内出版的党史教材大都将林彪定性为文革中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前引席宣、金春明书即是典型一例。那么林彪在文革初期到底是有意搞乱军队，从而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还是处心积虑稳定军队，并成为稳定军队的核心？这是我们应该认真予以探讨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军委随即举行了常委扩大会，由叶剑英传达了会议的精神。会议期间肖华、刘志坚以全军文革的名义请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到会讲话。军队高层干部们对如何开展文革运动忧心忡忡，忐忑不安，生怕军队也如地方一样大乱特乱，也搞全面夺

权运动。邱会作回忆说，“与周恩来相反，林彪政治上顾忌小多了。他坚决不许军队院校搞什么‘大串连’，不同意军队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委多次以命令的方式传达到全军各单位。”（页47）细查那时中央军委下发的文件就有：一、1966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指出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二、6月1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把军内的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部门。三、6月21日，中央军委下发《六条指示》，要求对军队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四、8月中下旬，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随便揪斗干部，处分干部。五、9月3日，中央军委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即军队不准组织红卫兵，不准地方到军队串连，不准军队到地方串连。

邱会作说：“直到1966年的9月下旬，林彪还是坚持以上意见。他不遗余力地设法稳定军队，使其不受社会上的影响，把军队的运动严格地限制在中央军委领导、管理的范围之内，部队要作好战备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提出这样的方针，算是有识之士了。有了林彪的支持，我们在一线的军队领导干部的态度很硬，当时有些军事院校的学生违反规定到了北京，军委各大机关都是派人劝回去。总后所属院校的来京学生，好言相劝不肯回去的，我就下令‘各学校来人把自己的学生带回去’。”（页48）

事实上，文革初期，全军文革小组积极紧跟中央文革小组，而全军文革小组的头面人物又是总政的副主任刘志坚，其他人还有参与起草《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谢镗忠等人。他们很早就参与了江青、张春桥搞文革的准备工作，这些人思想很左，认为军队内部也受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军队的各级领导也是接受教育或被批判的对象。所以，军队在文革开始时就已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到底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依靠军队院校师生搞“四大”和军内夺权，还是坚持正面教育，军队不搞造反。林彪显然是持后一种态度。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常委扩大会决定，继续执行五月中军委决定的精神，全军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革，不搞“四大”。

然而，毛泽东在1967年1月严厉地否定了林彪、叶剑英所制定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政策。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全国全面夺权斗争，1967年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林彪亲自主持了会议。而会议最重要的宗旨就是“巩固部队”，部队只搞正面教育，同时要加强管理，严格纪律，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这一政策得到全军领导干部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林彪在讲话中讲了很多战备的内容，用邱会作的话来说“当时只有用战备为名来压造反派捣乱。”军队中的老师也都到会，分别讲话。林彪还特别交代，对于毛在2月份严厉批判老师们的讲话（即所谓“二月逆流”中毛的谈话）严守机密，不许外泄，特别注意对他们的保护。（页118）

事实证明，从文革开始到“913事件”，林彪对保持军队的稳定的想法贯彻始终，中间虽然有所反复，但是军队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即使地方的夺权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有些军队院校造反派到军委总部和各军区搞“四大”，揪斗军队高干，但是军队内部并未发生自下而上的夺权事件，日后由于军队参与“三支两军”活动，军队势力进入地方政权，对稳定局势产生了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 六、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表现

以往的官史教材对徐向前在文革当中的所作所为语焉不详，除了提及徐向前曾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外，大都浓墨重彩地描述徐向前在“二月逆流”里的表现，更有人说林彪“特别是对



徐向前有严重打击”(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那么徐向前这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在文革中到底干了些什么？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探讨。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随着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兴起，军委各大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军委总部的李天佑、吴法宪、李天焕、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受到批判。明着无法与造反派抗衡，林彪、叶剑英就命令这些人躲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避难。叶剑英先后安排了赵尔陆、王秉璋、杜义德、吴法宪、邱会作等人躲进西山，暂避造反派的锋芒。(页66)全军文革小组的刘志坚等人虽然有中央文革撑腰，但是对林彪、叶剑英这些元帅的指示却不能不有所顾忌。江青这时想起了徐向前。徐向前虽然也贵为元帅，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徐在军内长期以来并无实权，只是负责民兵工作。江青在1966年12月三次去林彪处，要求让徐向前出任总政主任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并打出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与叶剑英、聂荣臻商议后，采取给徐“虚位”而非“实权”的办法，决定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总政主任一职仍由萧华担任。那么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又是怎么表现的呢？

徐向前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宣布由江青出任全军文革顾问，排名在总政主任萧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这样江青在军中发号施令就有了名义。邱回忆说：在全军文革小组第一次会上就宣布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放手发动群众；二是要彻底批判刘、邓，消除他们的反动路线在我军的影响；三是老干部不要怕群众，要自觉革命。徐向前说：当前高级干部害怕群众的‘恐惧症’是主要的，此病不除搞不好文化大革命。”(页84)这三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一直以来试图打破军队铁板一块的砖头，徐向前的走马上任为此铺平了道路。

1967年1月19日下午，徐向前亲自打电话到军委西山指挥所，对邱会作下令说：“现在总后机关的造反派对你意见很大，你不要在西山呆下去了，立即回去参加文化革命。你的问题，江青同志和我共同研究过不止一次，都认为不简单，不能很快地解决。我现在不是以全军文革组长的身份给你打电话，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向你下命令。你马上回总后去！”邱会作等人住在西山军委指挥所是得到林彪、叶剑英的批准的，也是对他们的特殊保护。而此时的徐向前却与江青同流合污将邱会作送进造反派的虎口。叶剑英得知后马上向林彪报告，叶随后向邱会作转述了林彪的话说“林总说了，既然人家已经下了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你那里和我(林)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会作回去以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严重情况，当采取紧急措施。”(页87)邱会作一回到总后机关就被造反派残酷武斗、毒打，几乎丧命，如果不是林彪直接下令、叶群持林彪、陈伯达手令以及叶剑英等人采取断然措施，派军队将邱从造反派的手里救出，邱很可能就如国务院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一般惨死在造反派的手里。事实上赵尔陆将军就是在全军文革小组的压力下，从西山回到国防工办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最后惨死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对于徐向前文革初期的表现，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一个讲话，专门提到此事。周恩来说：“对邱会作同志，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邱会作同志就是去年林副主席‘八·九’讲话说的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副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副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版)

自从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后，叶剑英军委秘书长的职权有被架空的感觉。1月26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举行常委扩大会，叶剑英与徐向前为了造反派揪斗萧华

一事而对拍桌子，叶剑英因为愤怒，乃至拍桌时用力过猛导致一小指骨折。由此可见，徐、叶二帅就军队内部如何对待文革造反

问题相互不满而引发对抗。现在有据可查的林彪对徐向前的批评是，王力等人向林彪汇报“二月逆流”时，林彪针对徐向前说了一句话“他不能代表解放军”。（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 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页982）

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确想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行动上积极配合中央文革，并与江青密切合作，以军委副主席的身分下令给军内高层干部，将他们送到造反派手中予以批斗，以此讨得江青等人的欢心。但是徐没有料到军内的反弹同样强烈，林彪竟然直接下手令从造反派手中强行救走邱会作，实际上就是对徐向前的一次坚决反击。徐向前此后再也无法给其他军中高干下如此之命令了。事实上，林彪出面保护的不仅仅是邱会作一个人，而是代表了林彪要保护军队老干部的整体态度。如果林彪此举构成“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的话，那么这个“打击”并无过错，反而应该得到人们的称道和赞赏。由于林彪的态度，徐向前不得不转变立场，1967年2月1日徐向前与总后勤部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谈话时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我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说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邱会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厉害点，对二医大红纵搞了许多小动作，我就不同意，邱会作说话有点不老实，喜欢搞点两面手法。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我们都是为革命，要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搞刘邓司令部的人，按两个阵营来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毫不含糊的。”（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年版）

## 七、军内造反派的溃败与萧华的倒台

长期以来，林彪一直被官方和国内党史学界指责军内造反的根源和后台，前引席宣、金春明书即说全国“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浪潮……这是林彪、江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将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的一个实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43页）林彪也被指责为蓄意打倒萧华等军内高级干部的罪魁。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林彪非常反感全军文革小组和军内造反派，林主要采取了以下的应对措施：

（1）对全军文革小组实行釜底抽薪。林彪直截了当地对邱会作等人说“他们（全军文革）叫你们去开会说事，你们别理睬，想办法推掉。”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宁可军队处于‘无政府’状态，也不让江青把手伸到军队里来。”5月8日，萧华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军文革的会，接见各单位造反派，研究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前一天萧华的秘书来请邱会作，邱说早在武斗场上就认识造反派了，不想再见他们。那天开会，老帅中只有聂荣臻去了，他感到“味道不对”，赶紧走了。叶剑英事先听了叶群的电话，去都不去。会上造反派反映他们在各单位受压的情况，而海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进去，双方大辩论，一度很混乱。萧华只好草草收场。以致全军文革日后再也无法组织开会研究军内文革事宜。（页133—134）

（2）明确支持军内造反派的对立面。在军内“513事件”中，林彪公开支持“三军革命派”，慰问被造反派打伤的人员，报刊连续报道军队领导对伤员的慰问等。林彪这么作，中央文革江青等人也不得不表态支持。此后，“三军革命派”又举行盛大演出，林彪、周恩来等率中央碰头会成员和在京党政军领导出席观看，并与演员合影，各大报纸、电台都予以突出报道。这次明显的政治性演出标示了全军文革的落寞和垮台。

关于林彪对于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邱会作回忆说：“全军文革有没有是小事，但有了江青在它背后就是大事了。江青是全军文革的顾问，有全军文革，她在军队里就有职务，没全军文革，她就没职位。林彪不让江青插手军队，不能明着说，就只好不要全军文革，不给江青可乘之机，哪怕是牺牲军队里什么人，也在所不惜。”（页136）

据邱会作回忆，萧华倒台有两个关键因素：

（1）1967年8月中央文革碰头会开会，由周恩来主持，会上讨论了萧华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文化大革命前整了一批高级干部，总部军兵种各军区都有，他们整到哪里，那的领导班子就不团结。2、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大家列举了许多实例，残酷武斗邱会作时全军文革有人竟在现场观看，激起会上不少人的气愤。3、军队并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全军文革仿效地方打倒刘少奇的方法，搞神秘化活动，扶植一派人揪人武斗，军队领导干部个个感到恐惧。这样的总政已脱离了全军，脱离了高级干部。（页138—139）

（2）所谓萧华“变节”的问题。江青从红卫兵手中掌握了萧华当年在山东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时曾经被伪军俘虏后又获救的所谓“变节”材料，江青一方面说要保萧华，同时又将萧华的“变节”材料捅到社会上，对萧华又打又拉。林彪为了保萧华特地去见了毛泽东，提出维持原山东分局的结论不变，并找萧华谈话。萧华则透露江青要参加中央碰头会及恢复全军文革事宜，引起林彪的警惕。当林彪得知江青的动态后决定先让萧华“靠边站”，躲过风头再说，这是对萧华实行的特殊保护，并与叶剑英、聂荣臻打了招呼。但江青却将萧华的材料转入她和康生控制的专案组，将萧华列为专案审查的对象，萧华由此而倒台。林彪对萧华能做的就是将肖放在卫戍区，不许中央专案组将他关进秦城监狱。（页139—140）

总的说来，林彪与萧华的关系一直不错，萧华也是林长期提携的军内高干，罗瑞卿倒台后，萧华出任军委第一副秘书长，文革开始后萧华也未受到冲击。恰恰由于江青插手军队事务，特别是对萧华的又打又拉使得问题复杂化，林彪为了不让江青插手军队得逞，不得已才同意萧华下台。

笔者认为，萧华在文革初期过分积极参与全军文革小组的活动，紧跟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大整了很多军中高级将领，引起众怒。另外萧华没有认清林彪与江青实质上的关系，以为跟着江青走就万无一失，这与后来杨成武的倒台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再加上萧华风派作风十足，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被人抓到把柄，最终导致了萧华的倒台。

## 八、“七二〇事件”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于“七二〇事件”，国内已有的党史教材大都指责林彪、江青蓄意挑起武斗事端。前揭席宣、金春明书即说“早在1967年春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中，林彪、江青一伙就把武汉军区作为打击重点之一。”但是现已有不少文章对此事件予以较为客观、详实的研究和分析。值得关注的就有徐海亮先生编著的《东湖风云录》和《武汉“7·20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542—573页），还有一些参与事件的当事人也发表一些回忆和文章等，如《王

力反思录》。但当时北京中央高层对突发的武汉事件是如何处理的披露不多，而邱会作回忆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空白。

林彪的态度。林彪对突发的武汉事件非常冷静，指示邱会作立即带一只精干的小队伍飞赴武汉。林彪指示说：1、向毛主席报告全国形势。全国有的地方闹事，但不能改变文化大革命的大局；2、请毛主席立即转移离开武汉，到哪由他自己选择，以便为他作好安排；3、武汉若是乱得很厉害，而陈再道又不听指挥的话，你在武汉保卫毛主席，固守待援。武汉附近的陆军第二十九师和空降兵第十五军已进入临战状态。你到武汉后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指挥调动救援部队行动。邱会作回忆说：“林彪相当冷静，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没有把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关系处理好，没有把武汉军区，特别是陈再道的思想作通，使矛盾激化了。只要处理得当，矛盾会很快缓和、化解。为了防止万一，必须作应有的防备。林彪还交代我带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小型医疗队去，以备急用。”（页147）

江青的态度。江青已从其他途径得到武汉方面的最新消息，开始时较为紧张，声称武汉发生“兵变”，毛被“劫持”了，要求林一定保证毛的安全。随后让邱会作带信给毛，要邱说服毛立即离开武汉。（页147）

毛泽东的态度。毛临飞上海之前召邱会作谈了几句话，毛说：“我太疲劳了，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形势的看法。但有一点林彪同志没有提到，那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我先到上海去，这的事留给总理处理。你早些回去吧，把情况向林彪同志说说。”邱说：“这是我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从毛主席口中听他说造反派不好的话。”当林听到邱的汇报提及毛这句话时，林彪高兴得点头称是。（页149—150）

中央碰头会对武汉事件的处理。中央碰头会决定以中央名义发表《告武汉人民书》，要求全国都要大张旗鼓地支持武汉造反派，并将武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由于毛泽东不同意，才未最后决定。7月23日中央文革在北京西郊机场搞了盛大的欢迎王力、谢富治的仪式。7月25日北京市革委会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凯旋。此外，中央碰头会还要求北京各界派代表团去武汉声援慰问造反派，同时还要求武汉造反派派代表团来京做报告，宣讲他们的事迹。7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扩大的中央碰头会批判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中央文革还顺便邀请了不少造反派的代表与会，以壮声色。8月1日的《红旗》杂志发表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揭露出来”。显然，中央文革利用武汉事件大做文章，希冀再次拉抬造反派的声势。

邱会作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直接作用就是毛就文革中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邱说：“‘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修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从完全信任支持造反派，改为节制他们，加大了使用军队干预运动的力度。对老干部，从一味‘炮轰’‘火烧’，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和刘少奇决裂，改为思想教育，引导干部‘自觉革命’，站在他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样，毛主席对‘王关戚’自然要考虑重新定位了。”（页156）日后陈再道、许世友等军队干部被接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免遭了造反派的武斗和冲击。这不能不说是“七二〇事件”之后的一个重要结果。由于中央文革要对武汉军区独立师支持了造反派的对立面大搞兴师问罪，对中央军委形成很大的压力，林彪为了不使中央文革借机插手军队事宜，干脆提议撤销该部队，并得到毛的批准。这在解放军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事实上，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爆发纯粹是毛泽东的极左政策的结果，毛泽东去武汉之前就认定陈再道压制造反派，中央碰头会已决定要扶持一下造反派，然后再搞所谓的“大联合”。但是局势的发展出乎了毛泽东的预料，毛的极左政策引起武汉地区军队的强烈反弹，引发了一场意外的风波。这场风波的发生与林彪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林彪不过是在事件发生后采取了

一些必要的应急措施。那种声称“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借机滋事的说法显然于史无据。

## 九、林彪的思想问题与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解放军高层在“二月逆流”后处于“无政府”状态：叶剑英、聂荣臻、萧华靠边站了，徐向前后来也不管事了，杨成武常常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邱会作则是躲避造反派藏在西山或京西宾馆办公。军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林彪的思想问题。

邱会作认为：林彪“思想问题”的根源来自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毛主席和江青虽然是夫妻，但他们以前没有特殊的政治关系，1964年以后连一起生活也没有了。1966年7月，正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紧张的时刻，身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就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目标、策略等问题作了甚为详细的论述。当时毛主席只给周恩来看了信，其他人如杨成武、王任重因陪同毛也知道了信的内容。由此，毛的这封信就有着非常神秘的色彩。

邱会作认为，“林彪知道了信的内容，思想有了疙瘩，他发现毛主席在重大问题上言行不一。毛主席一方面默许甚至让别人宣扬自己，许多人作了，林彪是很起劲的一个，但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这不是他的本意；毛主席一方面说要团结广大高级干部，但在信中却表现了对江青等少数人的依托和信任，而对广大干部却认为是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会一朝覆亡；毛主席一方面提倡党的领导，在信中则要把一些部门打得粉碎，顷刻瓦解。特别是毛主席交待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在军事上做了部署，还要林在会上公开讲‘防政变’，给江青的信中却说是他违心地同意的，是有人借助钟馗打鬼。在发起文化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突然同江青这个‘家属’谈起党和国家的大事来了，林彪没有想通。1966年8月八届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主席确定为他的接班人，好像对他非常信任了。但是到了1967年1月，他没有和林彪透气就突然发动了‘一月风暴’，接着又否定了林彪坚持的‘部队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政策。毛主席支持中央文革在反击‘二月逆流’中批判叶剑英、聂荣臻，搬开了林彪主持军队工作的两个最信任的帮手，又影射到了林彪本人。正因为如此，林彪不仅对文化革命的问题不敢多说，即使对他负责的军队事务也不愿多管，特别是对一些敏感问题更是这样。凡是毛主席没有表态的事他不吭气，毛主席有批示的文件，他就写上‘坚决照办’、‘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林彪处处表白与毛主席完全一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敢轻易表态，包括军队向中央文革、向江青的某些迁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源于此信。”（页166）

然而，军队事务没人管也不行，江青就在中央碰头会上提出成立一个办事机构。林彪原本就想这样做，此时则顺水推舟提出成立一个小组，落实中央碰头会下达的任务和管理驻京机关与部队的文革事宜，由此军委“四人小组”或曰“军委看守小组”诞生了。军委看守小组日后又过渡到军委办事组。

为什么林彪要用一个“办事组”统率军队呢？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邱会作回忆说：“1968年3月25日，林彪找接替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谈话，吴法宪和我作陪。林彪说：‘去年（1967年）3月间，全军文革快垮了，江青几次提出要健全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是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找他们的代理人，军委常委的工作也难于恢复，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请谁管事的问题。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中央文革）反对；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临时先用个小组管大事，这个方法靠得住。’”（页141）不能不说，这是林彪避免江青插手军队的高明的一招。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mailto: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